

抗战时期伪造货币述论

徐德莉

(重庆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 抗战时期,日本实施对华货币金融侵略政策,伪造法币成为日方破坏中国货币信用体系的重要经济侵略手段。同时,以汇兑本位制为基础的法币体系在遭遇他国货币进攻时易处于被动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伪造货币的大量丛生。通过对抗战时期伪造货币之具情进行认真梳理,其伪造货币情形归为两类:一是与金融货币战相关的伪造货币,一是普通民众伪造货币。大量伪造货币现象的出现给社会带来诸多影响,一方面,严重扰乱战时金融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币信用体系;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对巩固法币安全、维护法币信用更为重视,制订系列巩固法币信用、维护货币安全的措施。

关键词: 抗战时期; 伪造货币; 国民政府

中图分类号: K 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7) 02 - 0108 - 07

A Review of the Counterfeit Currency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XU Deli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Japan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monetary and financial invasion to China. Counterfeiting the legal currency beca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economic invasion. The legal currency system based on the exchange standard was in the passive situation when attacked by other countries' currency, which accelerated a large number of clusters of counterfeit currenc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paper carefully combed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counterfeit currency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and classifying them into two types: one was the cases of counterfeit currency concerning the war of financial currency, and the other was the cases of common people's counterfeiting the legal currency. The phenomenon of a large number of clusters of counterfeit currency had some influence on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it seriously disrupted wartime financial order,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influenced the credit system of the legal currency. On the other h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ttached greater importance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security of the legal currenc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redit of the legal currency, and made series measures to consolidate the security of the legal currency and maintain the credit of the legal currency.

Key words: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counterfeit currency; national government

收稿日期: 2016 - 12 - 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抗日根据地对伪造货币的治理及其历史经验研究”(编号: 16BDJ013)

作者简介: 徐德莉(1978 -),女,湖南隆回人,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抗日战争时期,大量伪造货币充斥市面,呈现货币与政治、经济、军事之间深刻复杂的关系。学界对抗战时期货币政策、实施过程、货币斗争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与考察,主要侧重于货币伪造问题产生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的研究。^①笔者试图对抗战期间伪造货币进行系统的整体的梳理与考察,以期从另一视角来考察抗战时期的金融货币史。^②

一、抗战时期伪造货币产生的社会成因

货币权是对外斗争的重要武器,在主权倍受侵略的情况下,货币权的控制也必将受到限制。货币伪造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它与系统的货币政策的内在机制和严密的机构相伴随,反映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

1. 法币制度的缺陷

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的法币改革,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列强之间“货币战争”导致中国银本位制崩溃的受动结果;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币制改革,获得货币控制权,以达到削弱地方省权、加强中央集权。国民政府是从货币本位制度、货币发行权制度和发行准备金制度三方面进行改革以期稳定币值。但是,货币的本质是由货币本位制度决定的,汇兑本位制使得货币币值的稳定取决于汇率的稳定,在经济主权受到限制的情形下,中国的货币价值是受他国的货币利益决定的。因此,受美英日操纵的中国币制改革注定法币是不具备独立性的货币。

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发行纸币成为国民政府解决军费与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但是中央政府又不能承担维持通货稳定的任务,这样,将货币赋予财政性格,不兑现的本位法币制度与统一的纸币发行权存在内在逻辑的矛盾,使之失去了“挤兑”约束力,无法维护币值的稳定,因此,有内在缺陷的货币本位制是导致货币运动呈现怪相的制度原因。^[1]

货币金融制度及其变迁往往交织着各种力量的利益博弈。法币政策推进行程中体现了中国政府与外国势力、中央政权与地方当局之间的利益博弈。别国的货币利益冲突决定着中国的货币价值,说明无经济主权也就没有货币主权。中央与地方势力处于政治博弈样态,货币发行权的控制与被控制自然呈现渗透与反渗透的多重面相。因此,法币制度本身机制的缺陷使得法币在流通过程中堵塞了,使许多商品化成分逆转为自然经济成分,出现逆货币现象,使得货币相对数量减少,导致货币运动呈现异相,市面出现诸多伪造之货币。所以说,货币伪造是货币运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特殊地方或特殊势力的货币权的控制者,很可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随时变更货币的价格标准。甚至有意地或有计划地把他们的货币,贬到一文不值。价值尺度与价格标准的不确定,正是各种特权借以施行经济及经济以外的榨取的有效手段。在中国主权受到侵略的情况下,货币权的控制必然大大受到限制,加之中国货币制本身的缺陷,特别是整个中国经济对外的严重依赖,使得法币不但不能进攻、不足以防卫,反而成为破坏本国经济的手段。因此,在防备他国货币进攻时处于严重的受动窘况。^{[2] (p95-98)}

2. 日本的金融侵略政策

战时特殊环境是货币伪造的社会背景,伪造其货币成为货币“进攻”的基本手段。通过伪造对方货币,达到扰乱敌方金融货币信用体系,破坏对方经济秩序,侵略国家主权与政治控制权的目的。在抗日

^① 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年;梁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货币战》,《东岳论丛》,2004年第6期;徐德莉《抗战时期日本伪造货币及中方治理对策》,《光明日报》(史学理论版)2015年7月8日;徐德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巩固货币金融安全的政策考察》,《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② 注:本文考察的着力点在抗战时期法币的伪造情形,至于战时根据地的伪造货币及其情形等另文再行论述。

战争中,日方和国民政府都发动了货币战,国民政府为了巩固统治与保障战争,进行币制改革,统一发行法币;日本为了控制国民政府的法币,在沦陷区发行中储券、“联银券”、军需票等各类伪币。此间,战争双方充分利用货币的力量达到自身的目的,汹涌如潮的货币伪造使得原本混乱的金融秩序变得更加杂乱无章。

日本在中国各地以货币手段,伪造中国货币,抢购物资,试图用这种方法来扰乱中国的金融秩序,摧毁经济命脉,损坏抗战的物质基础。伪满银行发行币券具有很大的任意性、侵略性,主要是扰乱中国货币体系,破坏中国经济基础。日本及其他外国的发券银行有横滨正金银行、香港上海银行、麦加利银行、花旗银行、华比银行、汇丰银行等,但这些银行的发行额都很低,发行情况如下:正金银行 400 000 元,花旗银行 197 000 元,麦加利银行 142 000 元,华比银行 11 000 元,汇丰银行 36 000 元,合计 786 000 元。^[3]由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银元纸币和日本银行、朝鲜银行发行的金元纸币,其流通量超过 1000 万元,在胶济铁路沿线城乡及青岛、济南广泛使用,其中仅青岛租借地的流通量就达 420 万元。^[4]

3. 战时“省行”辅币发行政策的变化

法币改革前,国内流通币种极为紊乱。1935 年,蒋介石派人在川省调查,“该省各军师以往多有自由造币或发行钞票、券据情事,基本金既无一定之款,发行额亦无明确之限制,而一般奸商,又复因缘为利,操纵行情,以致流弊丛生”。^[5]诸如此类的混乱局面在他处并不少见,各省拥有相当权力的“省银行”普遍存在。^[6]自 1935 年 11 月 3 日实行法币公告后,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银行。1936 年 1 月 11 日,国民政府公布的辅币条例,其中第一条规定辅币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其发行,由中央银行专司之”。^[7]全面抗战爆发后,针对敌伪投入伪券及伪造法币来抢购物资,国民政府放开省行对辅币的发行权,支持各省行发行省钞代替法币以防止敌伪经济侵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币发行不足。1939 年先后召开的两次地方金融会议,允许省地方银行发行 1 元及 1 元以下的辅券,“因近来查各省地方银行发行钞券未能悉依上述政令”,“其缴交准备金,亦多未合规定”,是故自应“统筹管理办法”。^[8]第三次地方金融会议又加强对省行发行币券的限制,强调要具有一定数额准备金,同时规定省地方银行必须严格服从中央管理。到 1942 年,中央政府加强了对省行发钞的监管,同年 7 月财政部关于《中央银行接收省钞办法》“所有各省地方银行的存款和准备金,均归中央银行保管”。国民政府还通过颁布《管理各省银行或地方银行发行 1 元券及辅币券办法》、《各省省银行或地方银行旧存钞券整理办法》等,进一步加强地方银行发行权的管理与控制,对省行发行币券进行严格的监督与管理。这些相互对立限制和抵消的种类繁多的货币在货币流通过程中产生了拥堵,被阻塞的又各自隔离使用,而与此同时,中国“内生”货币制度的缺陷在这一场景下又为多方伪造者提供了伪造空间,成为伪造货币诸多原因之一。

二、抗战时期伪造货币之各类具情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通过伪造货币扰乱中国金融体系,破坏中国经济关系,这使得以汇兑为本位的法币制度在流通阶段呈现异象,货币主权受到限制,货币发行控制权不一,多种货币堵塞于货币流通领域,伪造的货币亦成为当时货币流通中遭遇的常态。日方通过伪造货币,抢购国统区战略物资,破坏中国通货的公信力,扰乱中方金融市场,通述得货币战的胜利,进而达到政治进攻之目的。

鉴于伪造货币对于当时战事与社会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依托《东方杂志》《申报》《大公报》及各省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案卷等基本史料对战时伪造货币、行使伪造货币等进行梳理,借此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伪造货币的时域与场域,以期多维度剖析伪造货币之历史与战时社会结构。

1. 与金融货币战相关的伪造货币案情

1939 年 4 月 4 日,军政部发电“查禁敌方伪造钞票一案,查所称项钞票亟应一体查禁行使,除分行

并咨外交部,分转各该国驻华大使馆注意,卫司令长官检寄样票,并将发行机关及发行数额查复核办外,相应咨请质省政府查照。”^[9]1939年,广东省府报财政部,查禁敌伪将仇货及伪造中、中、交三行纸币源源运往汕头,然后潜运内地,企图破坏我经济金融。没收敌方伪造之货币仔细比照,表面上观察几乎难辨真伪,只有对着灯影照,伪造中央、中国法币内无水印总理像及水印实塔,仅有水印大日本三字。^[10]敌人伪造中央、中国银行法币数额甚多,并且规定敌军用手票十二元兑换伪造法币十元,严重破坏我方战时经济,干扰我国货币金融安全。

除了大量日伪造之货币,还有其他外国人伪造法币情形。如1937年1月17日上海警察破获一起由居住上海、东京、横滨之美法阿根廷白系俄人等十余名,结为团体,伪造中国中央银行纸币一千五百万元,欲以国际都市上海为中心投机银条,冀获巨利的案件。^[11]该类案件举不胜举,可参见《申报》《大公报》及《江西省政府公报》《广东省政府公报》等政府公报及各省及市地方法院案卷。^①伪造法币既是日本侵略的重要经济手段,也是其既定侵略计划。此仅指出公开登载见报较大影响的案件,意在揭示抗战期间伪造货币案发生频繁及其涉及面的广泛,也说明这正是日伪货币进攻的一种重要表征。抗战期间,日本伪造中国货币行为十分猖狂。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军部专门研究与制造中国纸币的登户研究所就伪造了40亿元法币。^[12]另外,还伪造了1936年中华书局印的中央银行无地名一元版,1937年德纳罗印钞公司印的中国银行无地名五元版等。^[13]1940年9月,日本大藏省印铸局伪造中国银行上千万元,其中有十元券五百万元,百元券五百万元。^[14]抗战时期,日本不仅伪造法币,还大量伪造根据地货币。1940年,日军在华北大量推行冀钞五元券的假票。1943年,日军在山东制造了大量的冀钞五元券假钞。在山东滨海等地发现的伪造的北海银行钞票分别从青岛、烟台等地混入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这些由三井、三菱等日寇财阀巨头策划下伪造的假票竟达两千万元之多。^[15]严重扰乱我抗日根据地货币金融信用度。

2. 普通民众伪造货币案情

在笔者所查阅的大量地方法院案卷中,除与上述货币战相关的伪造纸币案件,还有大量普通民众伪造或行使伪造货币等案。笔者也希望通过对此类案卷的解读,对其中犯案的具情、审断及改判经历的还原,分析民众伪造货币的原因及这类案件审判的趋向特点,以期更深入地解读战争在货币金融战方面对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以下案为例分析之。

梁富久(男,四十岁,从事船业,醴陵人)、罗性初(即罗三,男,三十二岁,驾船业,湘乡人)案。梁富久以驾船为业,罗性初帮其驾船,于1936年6月中旬装运磁器至津市,梁富久收集有伪造之中央银行五角纸币二十一张,在津市拿一张买鱼,用十张支付罗性初作为工资。七月九日船停泊在醴陵西门河边,梁富久复以该伪币向德庆长购物,该店未收。是晚赴玉明楼吃面用去二张,第二天早晨去购面条仍用伪币,因被退还,又持往冯姓铁铺买耙,被识破并报警,岗警在其身上搜出伪币四张,醴陵县公安局派警在其船上木箱内检获三张,又在罗性初衣内检出十张连同玉明楼前收之二张,解由醴陵县政府讯办。^[16]

据讯情所悉“玉明楼老板指明该被告第一次向玉明楼吃东西用掉了伪币,又第二次来行使,见其成色不对,并将其票子拿予德庆长处识别,将其票子退还,之后他又拿了一第真票子给之。”说明案犯梁是明知其为伪造之币而故意行使,又案情显示“梁富久先以之在津市买鱼,给付工资,后又向冯姓铁铺买耙”。可见,该犯故意行事是显而易见。梁犯此案该犯即为普通从事船业工人,所行之情是为行使伪

^① 同类案例可见《申报》1938年1月6日,第十五版;《申报》1938年3月18日,第十五版;《申报》1938年5月23日,第十五版。广东省政府公报,1936年第345期。广西省政府公报,1936年第121期。《湖南省高等法院档案》29-2-2066,1938年;29-2-2067,1939年;29-2-2026,1937年;29-2-2027,1938年;29-2-983,1937年;29-2-984,1940年;29-2-986,1940年;29-2-1536,1941年。《重庆地方法院档案》110-2-256,1939年;110-2-232,1939年。

造货币,用于民众日常生活之购买情事,由此足见,普通民众行使与伪造货币情事较为普遍,这样对于法币信用带来严重损害,严重扰乱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17]

又见一案:无业游民林福田在京伪造辅币,于8月9日捕获,在该犯身上搜得二十分伪辅币六十九枚,十分伪辅币二十一枚,经讯据该林福田供,年五十岁,闽侯人,十余年前曾以石膏模型伪造银角犯案,此次因贫私造锡质辅币等语,其意图供行使之用,而伪造通用辅币,经供证互为明确,当将该犯连同证物移送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核办在案。查悉该案犯伪造辅币手段极为简单粗糙,方法极为简易,伪造材料即为普通石膏锡等物。但却能以伪乱真,鉴别困难,若不加以防范,其影响国币,紊乱金融,为害至大烈。

通过对抗战期间货币伪造案进行统计观察,发现许多的伪造或行使伪造货币案,其团伙性质比较小,并且犯案者也多因生活窘迫所致,即犯案动机多数是与贫困、失业有关。从笔者所查档案资料可见,重庆市档案馆地方法院见伪造货币案件共计600件,其中绝大多数案件均为普通民众伪造与行使伪造货币,竟达438件。^①湖南省档案馆高等法院检察处及长沙地方法院档案所计伪造货币案共计2786件,其中被告为农民、无业及小手工业者的有2432件。^②天津市档案馆藏河北天津地方法院档案货币伪造案总计589件,其中被告为农民、无业及小手工业者的有467件。^③不完全统计可见,从事伪造及行使伪造之货币大多为普通民众所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法币信用安全受到严重危险。从各地档案馆的存档档案归纳,就能发现至少数千种案例,从中不难了解当时伪造货币案的泛滥程度。如长沙某县县长每次出巡至乡,目击此项情形,为维护法币信用,并免贻害地方起见,特严饬所属不分畛域,认真查缉,计最近两月之间,先后破获行使伪票案四起。^[18]由此说明,伪造货币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严重影响,同时,反映维护法币信用,巩固货币安全任务艰巨。

三、抗战时期伪造货币所带来的诸类社会影响

货币是经济运行的主体,在经济运行中处于前导地位与主导作用,货币是体现商品价值的载体,货币使得千万种处于无序状态商品运动状态,转化为一种可以控制的有序运动,因此,货币本身的信用度是使得一切商品运动处于有效与有序的基本前提。反之,货币信用度出现问题则会使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混乱,扰乱政府信用体系。抗日战争时期,法币的安全与否不仅关系到抗战的物质力量,还影响着人们对于国民党当局统治的信用度。因此,抗战时期大量伪造货币的现象,给社会带来诸多影响,经济方面体现在严重影响货币信用体系,导致后来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政治方面,国民政府当局对法币安全,维护法币信用在政策与法律层面十分重视,制订相对较完备的法律法规惩治伪造货币行为。

1. 货币信用危机

信用是体现货币支付手段这一重要职能,也是货币最为本质的手段。流通中的货币的效率是影响货币信用度的重要指标。当大量伪造货币出现,呈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使得货币在流通领域出现异象,导致货币作为经济运行主体作用大打折扣,导致货币信用出现严重问题。这正是抗战时期法币面临严重信用危机的内在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信用制度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计再高也不为过,”货币呈现信用危机势必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产生极大影响。

手持钞票而不能求购的事决非偶然,大量伪造法币流入市场,严重影响法币作为商品价值承载作用的有效发挥,导致币信用危机。大量假货币的涌现,使得法币严重失真,再加上普遍民众对于真假货币

① 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地方法院档案》档案号:109-1-72;109-1-77;109-1-745;110-2-256;110-2-232;110-2-342。

② 湖南省档案馆藏《湖南省高等法院档案》档案号:29-2-2066-2090;29-2-2026-2078。

③ 天津市档案馆藏《天津地方法院档案》档案号:J0001-3-11399-004;J0001-3-11399-005;J0001-3-11399-009;J0001-3-11399-011。

识辨力低,更加重人们对于法币安全的担忧,导致严重影响法币在市场有效通行,致使流通中的法币运行效率大打折扣,使得法币在实现货币的支付手段与流通手段时严重受损。法币信用问题还会导致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产生,例如,劣币把良币驱逐出流通范围之外,导致通货膨胀。最后演变为广泛的经济危机,政府政治控制力下降。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战争后期及战后呈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也可以说是大量伪造货币所带来的流弊。

2. 治理伪造货币对策

抗战时期货币伪造问题十分严重,对经济发展、货币稳定、民众生活、政府统治及抗日战争胜利均产生重要影响,国民政府也力图加以治理。为此,针对抗战时期严重的货币伪造问题,国民政府建构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治理对策。政府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金融法规,成立四联总处作为最高金融管理机构对金融实施严厉监管,全国实施战时金融统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为打击货币伪造行为、保护法币、维护货币稳定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与法律保障,为抗战长期坚持与取得最后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维护了战时金融秩序,提升了战时国家对政治、经济的控制力,在激荡的战时社会中获得暂时的国家稳定与社会活力。

国民政府先后制订严惩伪造货币的法律法规。如1935年刑法中有专门章节针对伪造货币,1937年又颁布《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此外,又如《关于处置沦陷区法币对策的决议》《关于敌伪在各地破坏法币情形的报告》《整理法币办法》《日人伪造法币对付办法》等等都对伪造法币的处罚做了极为详细的规定。同时,在具体实施时也表现极为严厉。1940年1月16日,戴笠致蒋介石电“查近来前后方迭破获制造中交农四行伪钞之机关,虽尚未发现受敌伪指使之凭证,但据生推测,此必敌伪以伪法币吸取我后方物资与破坏我法币信用之毒辣阴谋也。……扩大沦陷地区打击敌伪之行动计,伏乞钧座准生与贝经理密商进行。”^[19]财政部规定“总税务司转饬所属一体严禁贩卖仇货,即行使伪造法币,一经查获应以汉奸处治。”这对于抵制日伪扰乱中国货币金融信用体系,阻止各种破坏法币安全,保护货币信用,保障货币金融市场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通过对抗战时期伪造货币案情的深刻分析,透视种种货币伪造现象滋生的内生机制和外在动因,说明货币伪造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它与国民政府货币制度、国民党政权、日伪经济侵略等都有着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统一的政权是维护货币信用的基本要素。主权尚无保障之时,货币主权自然倍受侵犯。帝国主义国家力量的渗透隐现货币斗争的内情,说明无经济之主权也就没有货币之主权。因此,货币运动发生异化,伪造货币即为异化产物。货币伪造也从另一视角说明货币能否维持稳定,与政府的公信力与治理力休戚相关,由此说明当时中国货币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货币本身,而在于“一个统一政权,在治安、交通、度量衡及国内自由市场诸方面的相应设施”的建立与增进。货币伪造问题的产生,既与周边环境密切相关,又与货币制度本身紧密相联,因此,反映货币主权与政治主权是政府的最基本的生命,表明货币安全和国家安全休戚相关。

第二,健全的金融货币体系是防止伪造货币产生的根本前提。伪造货币既有基于获利的考量,又有货币进攻之图谋,在国家政权与金融主权的重叠,货币主权的发挥受到政权的干涉,法币被赋予财政性格的情况下,治理伪造货币则会呈现二元对立之怪相。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不需要兑现的法币被赋予财政性格,立法与执法不一使得诸多金融法令成为一纸具文,致使发行货币成为国民政府解决财政赤字的灵丹妙药,最终也正是它使得国民政府丧失统治的物质基础。

第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伪造货币的治理也非常重视,制订战时货币金融政策,颁布保护货币安全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对伪造货币处罚十分严厉。阶段性反击伪造货币固然有一定成效,但建构长效防范机制才是关键,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货币制度的信任基础更是根本。

参考文献:

- [1]邓翔,郭锐.为何货币政策需要关注资产价格[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3,(5).
- [2]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M].福州:福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
- [3]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 [4]青岛市档案馆.胶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A].帝国主义与胶海关[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关于今后四川各军不得自行印铸票币电稿”(1935年2月19日)[A].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 财政经济(四)[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 [6]周保奎.中国银行史[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75册)[C].台北:文海出版社.
-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公布之辅币条例[A].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 财政经济(四)[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 [8]财政部关于整理各省旧钞办法及拟订公布各省行发行一元券及辅币券办法呈(1940年5月11日)[A].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二编 财政经济(三)[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9]为令查禁敌方伪造钞票一案仰即遵照[R].云南省政府公报,1939,(11)(51).
- [10]广东政府公报[R].1939,(445)(51).
- [11]新新月报[N].1937-03-02.
- [12]戴建兵.日本投降前后对中国经济的最后榨取和债务转移[J].抗日战争研究,2001,(1).
- [13]郭静洲.华北、华中地区的中日货币战[J].东南文化,1995,(3).
- [14]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
- [15]郭晓平.太行根据地的金融货币斗争[J].中共党史研究,1995,(4).
- [16]湖南省档案馆藏.醴陵县司法处诉萧明初等妨害国币案[Z].档案号:29-2-1126:1-125.
- [17]市政公报[R].1936(373):14-15;广东省政府公报[R].1936(345):45-46;察哈尔省政府公报[R].1936(1033):8-9;广西省政府公报[R].1936(146):13.
- [18]长沙周报[N].1936(196):10.
- [19]“国史馆”藏.全面抗战(十七)(1940年1月16日)[Z].蒋中正总统文物 档案号:002-080103-00050-009.

(责任编辑:方兴)